

试论抗战时期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边疆学术研究

张俊宗，窦雅丽

摘要：全民族抗战时期，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在国难驱动与高校内迁背景下，秉持“教育救国”“文化救国”的使命，依托西北地域特色，开展了系统的边疆学术研究。以李蒸、黎锦熙等学者为核心，将师资培育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对西北边疆教育、史地文化、民族语言等领域展开深入调查与研究，形成《西北中等学校师资之改进》等标志性成果，并推动边疆学科建设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其学术活动不仅为战时西北开发提供了学理支撑，还通过发掘民族文化根源，驳斥了所谓的“中华文化西来说”，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该校的边疆学术研究，体现了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从传统史地考据向多学科综合实践的学术转向。

关键词：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边疆教育；西北史地；民族复兴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660(2025)02-0112-09

国难刺激之下兴起的边疆开发热潮是全民族抗战时期边疆研究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在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到，不同学术机关的边疆研究路径，亦受其自身学术传统与历史的影响。全民族抗战时期西南和西北两个边疆研究中心的形成即与教育内迁有着密切关系。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无疑是中国北方的学术重镇之一，尤其在教育学术研究方面成绩斐然，但当时鲜有学者对边疆教育进行深入研究。七七事变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被迫西迁，历经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最终独立设置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相继在西安、城固、兰州三地艰难办学。然而，与战前不同的是，在经费与物资极度短缺的状况下，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反而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西北边疆各省的教育、史地及语言文化等积极展开调查与研究，成为全民族抗战时期西北边疆学术研究的重镇之一。遗憾的是，既有研究成果多关注该校在全民族抗战时期所开展的师资培育、社会教育等活动，对边疆研究活动的整体性论述尚付阙如。^①基于此，本文从战时内迁高校“在地化”的视角入手，从

作者简介：张俊宗，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 730070）；窦雅丽，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兰州 730070）。

^① 相关学术成果有：尚季芳的《抗战时期内迁高校与西北地区现代化——以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为中心的考察》，《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王有春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述论》，《高教探索》2012年第4期；张睦楚的《“在地化”之探索：略论抗战时期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地方教育服务》，《当代教育与文化》2021年第5期；尚季芳、杨喜红的《北师大及西北师院对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制度的贡献（1902—1949）》，《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5期；张睦楚的《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中学教师暑期讲习会述论》，《教育史研究》2022年第4期。

学术转向、机构设置、学术活动等方面对全民族抗战时期西北师范学院的边疆研究活动进行论述,以期呈现战时内迁高校对20世纪30—40年代中国边疆学科建设的尝试与贡献。

一、从“辅导中等教育”到“奠定民族复兴之基础”的学术自觉

1937年7月,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危急关头,为保存文化火种,国内各大高校纷纷内迁。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于1937年9月初迁校西安,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等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3月,潼关告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迫于形势南迁汉中。4月,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战争和长途迁徙使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遭受巨大的损失,也对师生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当日军“窃据校舍校产,收买汉奸,组织伪北京师范学院,施行奴化教育,以遂其文化侵略之阴谋”的消息传到后方时^①,师生纷纷意识到保存高等师范教育火种、反对文化侵略已迫在眉睫。为此,李蒸偕同原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各学院院长及各学系系主任,于1938年4月拟具《关于高级师范教育之意见书》一文,上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请求国民政府教育部恢复高等师范教育独立体制的同时,他们还主张赋予师范大学辅导地方中等教育的职能:“师范大学区以内所需要之中学及师范学校师资,均应由本区内之师范大学作有计划之训练。即本区内中学及师范学校之教学及行政等,师范大学亦负有辅导改进之责。”^②这既是李蒸等学者为发展高等师范教育提出的制度改革方案,也是为内迁师范院校谋划的融入地方社会的“在地化”方案。

李蒸等学者关于恢复高等师范教育独立体制的诉求与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展战时教育的设想不谋而合。1938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师范学院规程》和《国立中央大学等校设立师范学院办法》,正式确立师范学院制度,计划在全国分区设立师范学院,培养中等学校师资。该制度在恢复高等师范教育独立体系的同时,还将辅导地方中等教育确定为师范学院的重要职能之一。《师范学院规程》第四条即规定:“师范学院应协助所划区内教育行政机关,研究辅导该区内之中等教育。”^③紧接着,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8年10月主持召开第一届全国高级师范教育会议。会上,经与各师范学院讨论协商,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师范学院辅导与研究地方教育作出指示:(一)全国应划分为若干师范学院区,各师范学院负责推进所划区内各省市中等教育;(二)各师范学院应会同区内各省市教育机关,组织中等教育辅导会议,研究各省市教育设施,讨论各省市中等教育问题,商讨各省市教育改进计划,筹划师范学院各科系招生名额,并分配师范学院毕业生服务;(三)师范学院应集合区内中等学校各科教员分别组织中等学校各科研究会,研究各科教材及教法之改进;(四)凡具有学术性的教育问题,得由区内各教育行政机关或各中等学校向师范学院咨询或委托研究。^④至此,国民政府教育部以法令形式规定了师范学院辅导地方中等教育的职能与实施途径。此次会议还初步划定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六省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区。

① 李蒸:《敌人摧残后之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通讯(汉口)》1938年第11期。

② 西北师范大学校史资料编研组编:《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史料摘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617—621页。

③ 《令发师范学院规程及国立中央大学等校设立师范学院办法仰遵照由》(1938年7月27日),西北师范大学档案馆藏,西北师范大学档案,33-WS-0002-0002。

④ 《飭令本校师范学院遵照全国高级师范教育会议决议案分别办理》,《西北联大校刊》1939年第8期。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独立设置后,即与陕西、甘肃、河南等省的教育主管部门协商,成立中等教育辅导委员会,开展暑期讲习会、国语注音讲习会等各类辅导工作,“在地化”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单纯地辅导地方中等教育还不能达到反对文化侵略的目的,也不能完全发挥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学术传统与价值。如何将培养中等学校师资与教育学术研究相结合,成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人群体迫切思考的问题。李蒸等学者首先认识到辅导地方教育须以学术研究为先导,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虽以造就师资,推进教育为目的,然教育与专门学术息息相关,不从事高深学术之研究,则教育之材质与方术必皆庸劣而不能与时代及地方环境相应。故在今日世界之学术竞争中,本院为完成教育任务计,自应首先进行西北之研究”。^①全面抗战时期兴起的西北开发浪潮则是改变西北教育学术研究状况的千载良机。李蒸指出,过去西北的教育不太发达,研究工作更未提倡,这是因为西北交通不便,生活比较困苦,不仅外界人才不肯来,本地人才也多外流。加之西北各省不断遭受天灾人祸,致使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更无人从事天然富源的开发。但全民族抗战以来,东南、华北各地人民逐渐迁移内地,来西北者日渐增多,尤其是“自西南国际路线封锁之后,西北开发与建设之声浪益高。此诚千载一时之良机,今后教育与研究工作的推动,可大量进行”。^②

李蒸等学者提出要将辅导地方中等教育与开发西北边疆、奠定民族复兴基础结合起来。殷祖英认为,西北师范学院是西北最高教育学府,对于西北教育及西北各方面都负有领导责任,全民族抗战时期,西北成了“我们国家民族争取最后胜利的大后方,所以对于西北情形更要关切注意”。^③李蒸则在《西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明确表示西北师范学院对于整个西北文化建设事业均应参与,具体而言:(一)恢复民族固有道德;(二)提高西北文化水平;(三)推进西北公共教育;(四)供给人民精神食粮,发扬民族精神。^④李蒸之所以将“恢复民族固有道德”放在第一位,是因为他深刻地意识到,“西北为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亦为中国文化发源之地,谈文化建设应从西北作起,盖因其有历史与社会的良好基础,略加人力即不难振奋复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理应肩负起这一使命,施以适当的领导,“以期早日奠定民族复兴之基础”。^⑤

“奠定民族复兴之基础”的宏愿已然确立,但具体该如何实践呢?李蒸提出人文社科应从考古学及史地方面入手,自然科学应以蕴藏资源考察研究开始,如农田、水利、矿产、畜牧等均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结合师范院校的属性,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研究工作,须以研究边疆教育为核心,既要研究中华民族固有文化以凝聚抗战精神,也要致力开发西北以支援抗战,从教育、文化和经济层面为中华民族复兴奠定基础。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自宜首先创办此种研究机构,负起实际准备之责任,以实现政府建设西北之国策”。^⑥

①《呈为拟请在本院设立西北语文史地研究所或就原有师范研究所分设西北语文史地研究部谨具计划书及概算乞核定由》(1942年12月28日),西北师范大学档案馆藏,西北师范大学档案,33-WS-0011-0011。

②⑤ 西北师范大学校史资料编研组编:《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史料摘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701—703、697页。

③ 殷伯西:《行西北的观感》,《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1940年第6期。

④ 李溪桥主编:《李蒸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

⑥《呈为拟请在本院设立西北语文史地研究所或就原有师范研究所分设西北语文史地研究部谨具计划书及概算乞核定由》(1942年12月28日),西北师范大学档案馆藏,西北师范大学档案,33-WS-0011-0011。

二、边疆教育调查与边疆学科建设

作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继承者,教育是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术研究的基本盘。1938年4月拟具《关于高级师范教育之意见书》时,李蒸等人即提出高等师范院校应设立教育研究院,研究教育学术本身,同时要研究文理各科教材及教学法,“具有地方性质学科之高深研究,如生物学、地理学等,亦得分设‘研究所’,其目的在训练学生以专门研究之技能,俾毕业后能就其任教之地域,实地调查研究”。^①1938年7月,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确立师范学院制度时,规定师范学院可以附设师范研究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紧紧抓住这一机会,以原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为基础,筹设师范研究所。1938年11月,师范研究所正式成立,聘任李建勋为主任。研究所的宗旨在原来“研究高深教育学术”的基础上增加了“协助师范学院所划区内教育研究机关,研究教育问题,并改进其教育设施”。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各学院独立办学后,研究所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研究所设有研究委员会,由研究所主任、教授及师范学院各学系系主任组成,以便集思广益,推进研究工作。

师范研究所成立后,旋即开展相关学术研究。在研究选题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实用化”与“在地化”特点。1942年,李蒸致函中央设计局时指出:“本院现设师范研究所,特重边疆教育。”^②师范研究所研究边疆教育最具代表性者,为金澍荣、杨少松于1942年合著出版的《西北中等学校师资之改进》一书。他们历时三年,收集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96所中等学校的1561名教师的样本,从中等教育概况、教师个人状况、教师服务状况三个方面对西北四省的中等教育进行了十分详尽的调查研究,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进对策,弥补了过去全国性调查中西北资料缺失及对策泛化的情况。^③通过对比研究,他们主张西北各省教育当局应从质的改造、量的补充、改善服务环境、保障教师生活与地位四个方面入手,提升西北四省的中等教育水平。

中等教育之外,学者也关注边疆地区的国民教育。1942年7月至10月,在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司的资助下,教育系郝耀东和史地系王心正二人对甘宁青三省国民教育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此项考察的总目标为:“用通信调查及实地考察方法研究甘宁青三省国民小学教师的来源、分配、待遇及训练机关。旁及于社会文化及地理背景,并附带研究边民语言的种类和边疆小学国语教育改进等问题。”^④1942年11月2日举办的国民月会上,郝耀东对此次考察情况作了汇报。

在研究甘宁青基础教育的过程中,学者意识到民族地区教育的特殊性。张云波主张因地制宜发展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教育,他认为,“边民就智慧测验的结果并不低于汉人,惟文化幼稚,见闻浅陋,因此学校教育较为困难,所以在施教育之先,应先授之以普通的技能”,以此

① 西北师范大学校史资料编研组编:《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史料摘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622页。

② 《为本院现拟兴办关于开发西北之教育事业所需经费拟请计划补助函送方案请查核采择》(1942年11月28日),西北师范大学档案馆藏,西北师范大学档案,33-WS-0011-0010。

③ 详见金澍荣、杨少松:《西北中等学校师资之改进》,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1942年版。

④ 《为遵令拟具甘宁青国民教育师资考察计划大纲路线图及用费表请核准由》(1942年5月13日),西北师范大学档案馆藏,西北师范大学档案,33-WS-0219-0006。

消除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学校教育。边疆地区的学校教育“首先注意教材,必以乡土教材为首本”。教材确定之后,还需注重师资训练,“各地须增设边区师范,施以边教专业训练,长期服务边地,方能收效”。^①进而他将边疆教育提到了巩固边疆的重要地位,“以往治边之策,皆曰‘临之以威,怀之以德’,自为名言,无可议者。但其结果,仅为消极之防范,非积极之开化”。消极防范的结果,使民族间的隔阂更为严重,因此必须以积极的教育开导为首要。^②

通过对边疆教育的调查研究,李蒸等人意识到语言文字差异是限制边疆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提出要从语言文字入手设立边疆学科,“若非特设讲座,长期肄习,不足为调查研究之资与沟通统一之备”。^③为此,他呈请国民政府教育部拨付补助款项设置边疆建设学科及讲座。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了这一申请,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遂于1943年年初在史地学系设置边疆建设科目,纳入史地系本科教学体系。课程主要包括西北边疆史、蒙古史、西北边疆地理,分别由黄文弼、张云波和周廷儒讲授。1944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拨付西北师范学院边疆建设科目及讲座补助费三万元,并“指定西北语文及史地为研究中心”。^④

此外,黎锦熙也极力推动战时边疆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与国语运动。1942年,他发表《论全国方言研究调查之重要及其工作计划》一文,指出:“研究中国方言,应有广狭二义:只以汉语各种土语方言为对象,是为狭义;兼及境内其他各族之语言,是为广义。今宜同时并进。汉语地广人稠,调查亦较便。而西北、西南各境,他族较多,现正开发资源,推进文化,关系国防,亟当兼及。”再者,西北、西南各种方言,“非有专门学术之研究工作,且同时以解决此等实际问题为工作目标者,不能为也”。^⑤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指示黎锦熙以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名义,指导调查西北地区的方言方音,并主持协助西北地区国语推行师资训练工作。为此,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于1943年5月开设方言调查干部训练班,“每星期五下午讲习两小时,预定讲习约五六周,为第一期之基本训练”。^⑥同年,该校又利用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司拨付的边疆建设科目及讲座补助费,增添维吾尔文讲座,聘请众多由新疆考察归来的专家来校作短期演讲,增进了师生研究边疆的兴趣。1944年,为训练国语师资,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增设国语专修科,专修科学生每班额定40名,可由各省市保送学生入学,修业期为两年。^⑦

黎锦熙原本计划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设立专门机关,与各学府配合,调查全国方言,但囿于现实,未能实现。因此,他只能改变策略,“将三十一年所准备之西北区十八

① 张云波:《边疆教育》,《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1941年第37期。

② 张云波:《四川西南边区教育及其前途》,《中等教育季刊》1941年第4期。

③ 《为本院现拟兴办关于开发西北之教育事业应需经费拟请计划补助函送方案请查核核择》(1942年11月28日),西北师范大学档案馆藏,西北师范大学档案,33-WS-0011-0010。

④ 《令知该校三十三年度设置边疆建设讲座核定补助费及研究中心由》(1944年7月6日),西北师范大学档案馆藏,西北师范大学档案,33-WS-0242-0003。

⑤ 黎锦熙:《论全国方言研究调查之重要及其工作计划》,《建国语文月刊》1942年创刊号。

⑥ 《方言调查干部训练班开班》,《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1943年第54期。

⑦ 《为增设国语专修科一事给西北师院的训令》(1944年7月15日),西北师范大学档案馆藏,西北师范大学档案,33-WS-0027-0010。

省,凡一百六十五市县方言及三种边疆语文,配合于新修方志之工作”,并于1944年编纂完成《洛川方言谣谚志》和《同官方言谣谚志》。其中,《同官方言谣谚志》极具学术价值。该志梳理完成了3500多个汉字的“方言字谱”。时人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其搜罗之广博,考订之详尽,可革旧志陈陈相因之弊,奠定创修方言谣谚志之基,手此一篇,虽不谙其地之方言,亦可略知梗概矣。”^①

在对西北各省教育基础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与西北各省教育主管部门合作,举办各类暑期教员讲习会。同时办理小学教育通讯研究处研究小学教育实际问题,以通讯的方式指导在职小学教师研究教学问题。1941年,李蒸上呈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报告显示:“过去业已招生三期,而每期参加研究生之人数均较前一期增多,并研究生服务分布区域业已普遍大后方四川等十五个省份。”^②国民政府教育部审查后认为,“该院举办小学教育通讯研究颇著成绩,殊堪嘉许”。^③与战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教育学术研究相比较,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边疆教育研究真正走上了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道路。

三、西北史地调查研究与考古发掘

早在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和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时期,内迁西北的教授学者就已经格外关注西北史地研究与考古发掘。史地调查方面,1938年3月,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派校务委员会常委李耕砚与体育系主任袁敦礼、纺织系主任张汉文等教授同赴天水、兰州、西宁等处进行实地考察,目的在于“相度地宜、衡量人事,并探察天然资源,以为计划发展本大学及西北教育之根据”。^④1939年7月至9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组成教授考察团,对甘肃、宁夏、青海三省进行学术考察,考察范围“分为政治经济及历史地理两组”。^⑤考古发掘方面,1938年8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鉴于“全国抗战正在进行,对于民族先贤,自应尽力表彰,以为提高民族意识之先导”,派遣该校考古委员会委员何世骥带领学生50余人,对陕西城固张骞墓进行了考古发掘与修葺维护。“虽仅清除墓道一部,所得遗物不多,但价值实足上补马班史汉两传所不及。”^⑥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成立以后,沿着西安临时大学与西北联合大学时期的学术路径,持续大力开展西北史地研究与考古发掘工作。以师范研究所为先导,李蒸计划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增设相关研究机构,以开展研究。考虑到经费有限,大规模发展各学系的研究工作在事实上存在很大困难,李蒸认为,“创设西北边疆语文史地之研究机构,较为轻而易举,人材不难,经费亦最省”。且当时“各大学多注重工科理科,鲜有特别发展语文及史地者,为各尽所长与急切供应西北方面之需求计,此实为最经济最简易之办法”。^⑦研究机构成立之后,可以延揽国内

① 爰:《史学书评:同官方言谣谚志》,《史学杂志》1945年创刊号。

② 《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小学教育研究通讯处工作概况及经费困难情形报告》(1941年8月),西北师范大学档案馆藏,西北师范大学档案,33-WS-0220-0003。

③ 《部令嘉奖本院小学教育通讯研究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1941年第32期。

④ 《本大学派员赴甘青两省考察》,《西安临大校刊》1938年第11期。

⑤ 《甘宁青暑期考察团筹备会第一次筹备会议记录》,《西北联大校刊》1939年第17期。

⑥ 《民族英雄汉博望侯张骞墓西北联大表彰修理》,《西京日报》1938年11月23日。

⑦ 《呈为拟请在本院设立西北语文史地研究所或就原有师范研究所分设西北语文史地研究部谨具计划书及概算乞核定由》(1942年12月28日),西北师范大学档案馆藏,西北师范大学档案,33-WS-0011-0011。

语文史地专家来西北调查考察。同时也可在校内设置讲座,既可以增加大学教育效果,又可以解决教授缺乏的问题。因此,李蒸于1942年12月上书国民政府教育部,呈请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设立西北语文史地研究所或在原有师范研究所分设西北语文史地研究部,并拟具了详细计划书。学科建设方面,提出依照师范研究所成例开展西北语文史地研究生教育,并设立蒙古语、维吾尔语和藏语等讲座。调查与研究方面,提出以兰州为中心,“自近及远,次等达于甘、陕、宁、绥、青及蒙古、新疆等地,必要时可在敦煌(甘)、迪化(新)、科布多(蒙)、都兰玉树(青)等地设立工作站”。语文组可对西北各省汉语方言、西北边疆各族特殊语文、西北境外语文(中亚各种古今语文)展开调查及研究。史地组可对西北各地历史文献及古迹古物、西北各民族社会背景及习俗、西北区域地理、西北边界地理环境等展开调查与研究;对西北现有中外史料、西北现有中外地理图籍游记等开展考订与研究;还可对特殊问题,如西北各民族文化研究史、国父实业计划中各项建设之地理基础、西北各地冰川之地理分布及其移动等开展调查研究。教育工作方面,语文组就西北方言调查所得,分别编订各地方音字汇及方言词汇,以备各地各级学校矫正方音土语之用,以期统一汉语之国音。同时,在边疆地区推行国字国语,就边疆各族特殊语文之调查及研究所得编印对照课本读物,配合各种边疆教育工作。史地组在调查区域内随时宣讲,或编写通俗读物,以培养边民之国家观念。

这是一个庞大、系统的学术研究平台建设计划,彰显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对西北边疆学术研究的整体性考量。但受战时环境的制约,这一计划并未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1943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回复西北师范学院,“查本年度各校不得增设研究学部一案,前经本部通令各校知照在案,该院所请增设西北语文史地研究所一节碍难照准”。^①西北师范学院只能退而求其次,利用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边疆建设科目之机,由史地系教职员组织成立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会。该会以“研究西北史地以求国人之注意西北”“研究西北边疆以供政府建设西北之参考”为宗旨。1944年1月,学校又在史地系内设立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室,“尽量收集有关西北之史地资料,以期有裨边疆教育之研究”。^②

尽管有诸多的现实困境,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学人群体还是乐此不疲地开展学术研究。1944年2月,史地学系鉴于自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室成立以来,“本院员生研究西北之兴趣顿感增高,然以缺乏正确之史地材料,国内各书局又缺乏出版边地之图书,殊不足供应研究西北教育之需要,近来考察西北之学术团体与专家等来本院参观者,莫不期望本院史地系宜多作实地考察”^③,呈请国民政府教育部拨付经费,考察河西史地。是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了史地系的考察计划,并拨付四万元作为考察费用。考察队由陆懋德及史地系教授三人组成,由兰州出发,经永登、乌鞘岭、古浪、武威、永昌、山丹、张掖、临泽、高台、酒泉,出嘉峪关,经玉门、安西,至敦煌,然后返回,历时两个月。

基于细致的学术考察,学者对西北历史、地理、经济与文化等有了综合全面的认知。何世骥继发掘张骞墓之后,对陕南及兰州周边的史前遗址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先后发表《今后之考

①《据呈请设立西北语文史地研究所一案碍难照准指令知照由》(1943年2月9日),西北师范大学档案馆藏,西北师范大学档案,33-WS-0021-0008。

②③《为本院史地系拟具暑假考察甘肃河西史地计划及预算呈请核准由》(1944年2月11日),西北师范大学档案馆藏,西北师范大学档案,33-WS-0147-0002。

古学》《西北考古记略》《研究中国之古外国语文与研究西北》《中国文化起源于西北》等文章。在《中国文化起源于西北》一文中，何世骥得出“我国古代文化统一性之大与民族一元之说当可成立”，直面驳斥了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指出“安氏文中，必谓我国西北之文化来自西方（近东），则仍不免外人轻视中国之私见”。^①

殷祖英对西北地区的经济地理文化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先后发表《西北国际路线与抗战》《甘青地文与人文》《行西北的观感》《西北资源问题基本的认识》《论西北文化国防问题》《新疆中苏国界问题》《重开玉门古路问题》《忆敦煌》等文章，从地理与文化层面探讨了开发西北边疆的路径。他认为，西北地区以河西走廊为中心，其东南的陕甘为内西北，其西北的新疆为外西北，其东北的宁夏为西北的右翼，其西南的青海为西北的左翼。“经营西北、开发西北，自然要从内西北作起，渐而推至左右翼，渐而推至外西北，这种自然形势的顺应，是解决西北问题的第一个条件。”^②至于西北问题的内容，就是如何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问题，应从经济、政治、民族文化和国际外交四个方面着手解决，但“问题的核心部分与其解决的出发点，端在经济的开发”。特殊的地理环境致使西北成为一个交换经济地域，而非一个自足经济地域，因此，西北经济的开发“首需交通条件的辅助，惟交通条件促进其对外交换，始能增加其生产的价值”。^③经济开发的同时，要注重对西北文化的研究，“千佛洞艺术，虽属佛教艺术，实际兼有历史社会艺术之种种价值。不但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充分现显，西方文明亦多流露，实为亚洲文化综合的结晶。其地位虽与云冈、龙门并称，但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则远过之”。^④文化建设也是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举措，新疆的文化建设必须以中国本位的文化为张本，须排除外入的文化因素。^⑤

黄国璋重点考察了西北各省的经济现状，主张因地制宜发展西北经济。他指出，“近来报纸杂志上，常有关于西北经济建设的文字发表，或谓西北如何地大物博，如何可以移民实边，如何宜于发展农业工业等”。这固然有利于鼓励国人前往西北、开发西北。只是所谓移民实边并不符合西北经济发展的实际，“欲谈西北农作物之增产方法很多，如开发水利，培植森林，保蓄田水土，以及发展经济作物等皆是最可收效的方法，但必须以改善区内居民之生活为前提，切不可自外移民，徒增生活上之竞争与穷困”。他进一步指出，西北“发展农业畜牧业应自保蓄水土培养水源等着手。此均应以教育为先，使人民了解其重要性而愿与地方当局合作，遵守法令，不加破坏”。^⑥

1944年至1945年，史地系教授阎文儒参加了由“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联合组建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与著名考古学家向达、夏鼐一起历时一年半，对河西走廊的历史遗址进行调查发掘，重点考察了敦煌莫高窟。^⑦此次考察学术成果颇丰，

① 参见何世骥的以下文章：《今后之考古学》，《读书通讯》1940年第7期；《西北考古记略》，《读书通讯》1942年第52期；《研究中国之古外国语文与研究西北》，《西北学报》1943年第1期；《中国文化起源于西北》，《新西北》1944年第12期。

② 殷伯西：《行西北的观感》，《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1940年第6期。

③ 殷祖英：《西北资源问题基本的认识——西北经济地理的特殊性》，《西北资源》1941年第4期。

④ 殷祖英：《忆敦煌（续）》，《正报（西安）》1945年5月18日。

⑤ 殷祖英：《论西北文化国防问题》，《西北学术》1944年第4期。

⑥ 黄国璋：《西北当前的几个经济建设问题》，《曙光（重庆）》1946年第1期。

⑦ 阎文儒：《中国考古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165页。

“使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上了真正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道路”。^①

可以看出，抵御外来侵略，发扬中华民族固有文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加强西北边疆国防建设是全民族抗战时期西北师范学院学人群体开展学术研究的共识。

综上，全民族抗战时期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继承并发扬了原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学术传统，在李蒸、李建勋、黎锦熙、何士骥、殷祖英等学者的带领下，以发展西北边疆教育、奠定民族复兴基础为使命，将培育师资与学术研究有效结合；以师范研究所为中心，积极打造各类边疆研究的学术平台；以研究边疆教育为先导，对边疆史地、边疆经济开展调查与研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学人群体，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饱受战争摧残、被迫流离的学人群体将边疆学术研究与国家、学校及自身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学术研究，向上为国家、为民族谋复兴之道，向下为学校、为个人谋求安身立命之所。也正因此，他们的边疆学术研究既有抵御外侮、熔铸民族精神的使命感，也有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务虚言的经世致用意愿。

从中国边疆学科发展的视角来看，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边疆学术研究正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从“书斋”走向“田野”、从传统“史地”研究转向多学科综合研究、从学术边缘走向学术中心的生动表现；也是边疆民族研究从过去的“夷夏之别”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熔铸的生动体现。

（责任编辑：李 洁）

On the Frontier Academic Research of National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During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hang Junzong, Dou Yali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against the Japanese aggression by the whole n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disaster and inward migr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ational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adhered to the mission of “saving the country with education” and “saving the country with culture” and relied on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Northwest China to carry out systematic frontier academic research. With scholars such as Li Zheng and Li Jinxi as the core, combining faculty cultivation with academic research, it conducted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in the fields of Northwest frontier education,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and ethnic languages, forming landmark achievements such as *Improvement of Faculty in Northwest Secondary Schools* and promoting frontier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nd ethnic language research.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provided academic support for wartime Northwest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e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by exploring the roots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refuting the so-called theory of “Chinese culture comes from the west”. The frontier academic research of the school reflects the turn of frontier academic research in China from traditional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textual research to multi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practice during the war against the Japanese aggression by the whole n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frontier education; Northwest history and geography; national rejuvenation

^①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院年鉴（2019）》，甘肃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8页。